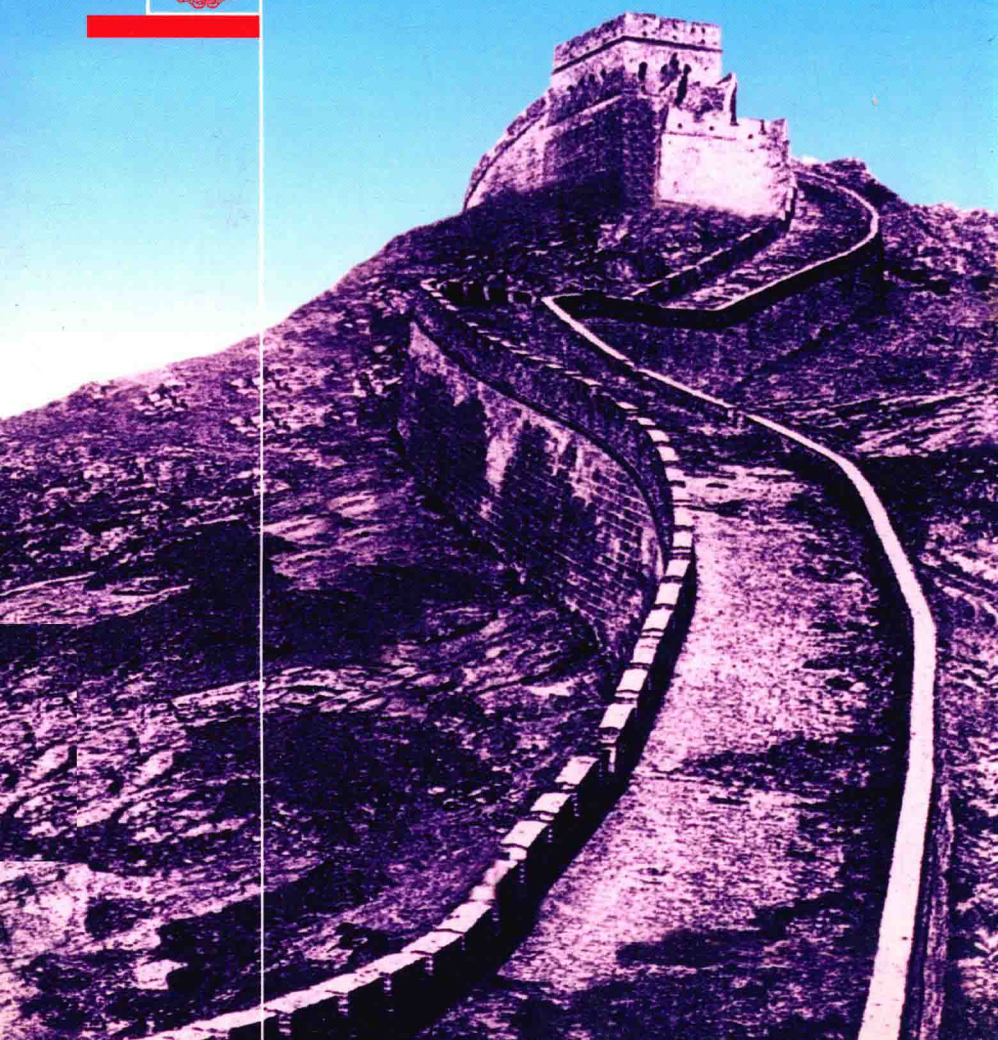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小丛书合集



古代文学家传记

上



中国历史小丛书合集

古代文学家传记

上册



责任编辑：徐敏霞

中国历史小丛书合集
古代文学家传记
(全二册)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白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2 1/2印张 465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12000册 定价：28.00元

ISBN 7-101-00667-1/Z·70

目 录

屈 原	李 力 (1)
陶渊明	王绍龄 (29)
李 白	乔象钟 (61)
杜 甫	李宪昭 (111)
韩 愈	倪其心 (161)
白居易	褚斌杰 (217)
柳宗元	陶剑琴 (255)
欧阳修	袁行云 (277)
苏东坡	陈华昌 (305)
李清照	蔡国黄 (341)
陆 游	齐治平 (375)
辛弃疾	杨牧之 (407)
王实甫和《西厢记》	潘兆明 (463)
吴承恩和《西游记》	潘兆明 (503)
汤显祖和《牡丹亭》	蔡国黄 (537)
孔尚任和《桃花扇》	曹增祥 (575)
曹雪芹和《红楼梦》	冯尔康 (597)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冯伟民 (659)

屈原

李力



風 凰

大 年



一、诗人的诞生和家世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旧历正月十四日^①,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诞生在楚国一个破落了的旧贵族家里。屈原的父亲名叫作伯庸,是一位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的人,他推算这个新生婴儿的生日正是寅年(太岁逢寅,旧星历学上称摄提格)、寅月(正月)、寅日(庚寅日),而这种现象正符合于中国历法中“人生于寅”的老话,所以他对这个孩子格外看重,给他取名“正则”,意即平正的法则,其中包含“平”的意思;取字“灵均”,意即美而平均,其中包含“原”的意思。屈原本人在他著名的代表作《离骚》的开篇,就回顾了自己的生辰和名字的由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是古帝高阳的子孙,伯庸是我已故的父亲。正当寅年的寅月,庚寅那天我出生。研究了这个吉祥的生日,先父赐给我相应的美名:给我取名叫作正则(平),给我取字叫作灵均(原)。〕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说:“屈原者,名平。”这也说明,屈原的本名叫屈平,字原。后来,人们用惯了他的字,而他的本名“平”反而不常被后人知道了。

^① 关于屈原的生辰,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这里采用比较通用的浦江清先生的说法,见其《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屈原的名、字与他的生辰配合起来是很有讲究的。从字面上看，“平”是平正的意思，而平正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尔雅·释地》：“广平曰原”），是地的象征。这样，屈原的名、字和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①。当然，这些说法都只是古代人的思想认识。今天看来，屈原的生辰年月都逢寅，不过是一种日期上的巧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个美好的生辰对于年青的屈原来说无疑是引以自豪的依据。《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的生日既具有天地之美，又加上许多奇异的才能）。诗人正是怀着对自己先天美的自豪感，在贵族家庭中成长起来。

屈原的家乡在今天湖北省的秭归县，那里是楚国最早建国的地方。屈原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他的祖先与楚王同姓，他与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Zhuān—xu*，专续）氏。相传，颛顼兴起于高阳地方，他有一支叫做季连的六代孙开始姓姜（*mǐ*，米）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yù*，育）熊的曾孙熊绎（*yì*，易）因祖上有功，周成王时被封在楚，住丹阳（今湖北秭归）。这就是楚国建国的开始，而熊绎便是楚国的第一代国君。可见，楚国本应姓姜，到鬻熊以后姓熊。屈原与楚王同姓，则也应姓姜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②，后来，随

① 这里用游国恩先生的说法，见游国恩：《屈原》。

② 春秋时期，人们往往有姓也有氏。姓是全族共同的称号，氏是某一支派的称号，所以常有同出于一姓而氏号各异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被作为他家的本姓而流传下来。

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族开始衰落下来，屈原辞作中“勿忘身之贱贫”的话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那时，屈家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二、战乱中成长的青年诗人

屈原诞生的时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原来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

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它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①。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屈原的祖国——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悠久,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1949年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湖南等省发掘清理的数千座战国楚墓中,发现了大量代表楚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铁器、铜器、丝织品、漆器、竹器、竹简、帛书、帛画、毛笔、琉璃器等更为历史、考古学界所重视,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已经是相当高度发展的国家。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

^① 因六国均位于秦以东的崤山之东,故称“山东六国”。

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哀叹：“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旌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它五国都十分迫切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与“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最终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先人所创立的光辉功业的激励，也由于成长在一个虽然家道中落但仍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诗人从年青时代起就胸怀远大的志向，刻苦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潜心研究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立下了为祖国的

振兴富强而献身的决心。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青年时代写下的优秀辞作《桔颂》中。

“桔颂”，就是对桔树的颂扬和赞美。青年诗人屈原通过对生长在自己故乡，楚国江汉流域的桔树的由衷歌颂和赞美，表达了自己对纯洁高尚品德的赞美和追求，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严以律己的精神。他在辞中写道：“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天地生成最美树，桔树适应水土生。禀受美质不变更，唯有南国生得盛。根深难以迁它乡，意志坚定不可移。绿的叶子白的花，美好姿容爱煞人^①。）桔树生长在南方，不能往“北国”移植，这本来是植物的自然生态属性，但诗人却将桔树的这种自然特征拟人化，赋予它以活的生命力，热情赞美肯定了它“深固难徙”“受命不迁”的精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自己祖国无限眷恋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在战国时期人们纷纷为官或为财而游说四方，在朝为秦宾、暮作楚客的风气中，青年诗人所表达的这种爱国志向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屈原后来政治上屡遭迫害和打击，但他始终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实践了他通过《桔颂》而作出的立志为国，“受命不迁”的誓言。

屈原在《桔颂》中，还借桔树果实的“精色内白”、“纷缊宜脩”的特点，赞美了人世中崇高圣洁，无偏无私的美德，表达了自己誓死不与丑恶的东西同流合污的决心：“精色内白，

① 本文所用的大部分屈原辞作今译，均依照张家英同志《屈原赋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特此说明——编写者。

类任道兮。纷纍宜脩，姁而不丑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醒独立，横而不流兮。（外表黄来心洁白，像是志士和仁人。气味芬芳品质美，人人夸赞是上品！……根子扎得深又深，胸怀豁达无私心。挺拔坚强立世上，不与流俗共浮沉。）屈原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向腐朽落后的势力妥协，更不与之合流的精神，也正是来源于他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

《桔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诗人青年时期就具有的美好而坚定的理想和情操。

从为官到第一次被放逐

青年时代的屈原，由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已经成为一位在文学上有着较高造诣，在政治上有真知灼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做了楚王的文学侍臣，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一起，在楚兰台宫联藻赋辞，也曾跟随楚王游猎于云梦洞庭，赋辞作歌。这些情景，散记于汉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王逸对屈原辞作的注中。

大约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屈原二十二岁时又被升任为左徒（左徒的地位仅次于丞相），担负起协助楚王治理国家的重任。

从这时起，屈原就全力以赴地将自己振兴祖国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主要做了二方面的工作。一是整顿内政，加强法制，以求富国强兵；二是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合纵”方针，联合齐国，抗击秦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

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说明屈原当时受到怀王的信任，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既直接参与怀王商议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法律政令，又肩负着对外斡旋交涉、协调各国关系的重任。这一时期，应该是屈原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鼎盛时期。

但是，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一时重用屈原，他们一伙当然心怀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的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稿子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煞有介事地挑拨说：“大王让屈平制定法令，朝中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他制定的每条法令一公布，总是自我吹嘘说：

‘除了我之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怀王听信了靳尚的谗言，十分恼火，不但疏远了屈原，而且免去了他左徒的官职。

《渔父》篇中称屈原为“三闾大夫”（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职），大约就是这时的职务。这件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只有不足百字的简单的记载，但如果把它与当时楚国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在各国都在变法图强的时候，屈原代表着统治阶级中革新、进取的一派，一心要以修明政治、加强法

治来使国家富强，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和不利于统治阶级中代表腐朽、反动的奴隶主旧贵族的利益。他们本能地感到屈原制定的新法对自己不利，所以急迫地要对新法加以篡改和阻挠，并对新法的制定者屈原进行造谣中伤。因此，上官大夫靳尚夺稿的行为决不是简单的嫉妒贤能和掠美之举，而是楚国统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一场遭遇战，屈原在这场交战中孤身奋战，终因敌不过强大腐朽势力的反扑而失利。

后来，屈原在他的辞作《九章·惜往日》一篇中，悲愤地追述了自己的这段遭遇：“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从前我曾得到君王的信任，受命改革时政。我以先辈的功业为榜样，以法律辨明一切是非曲直。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创立新法，本是正直的臣属乐于承担的责任。虽然我掌管着国家的重权，但仍愿与人为善地宽厚待人。我一心为国不泄露机密，却遭到奸谗小人的诽谤攻击，君王怒火满腔地对待臣下，也不辨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屈原在内政方面的革新措施受到了挫折，但仍怀着对祖国和怀王的一片忠心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他坚持“联齐抗秦”的战略主张，始终把秦作为打击和孤立的目标，全力维系楚与其它山东五国、特别是齐国的友好结盟关系。但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和旧贵族奴隶主集团的干扰反对，屈原的这种正确的外交策略也常常不能实施。

当时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

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时，秦派“连横”说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左右如靳尚等一伙官僚，并诱骗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国的联合，秦国愿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礼物送给贵国。贵国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土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这番话，答应了断绝与齐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还乐不可支地宣布说：“我们又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对于怀王这种利令智昏的错误作法，屈原和朝中较为清醒的老臣陈轸都站出来反对，但未能阻止怀王的一意孤行。他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并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

楚国受地的使者来到秦国，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一定是秦认为我们与齐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便又派人跑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一通。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时，张仪感到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才出来见楚国使者说：“你怎么还不前去接受封地呀！从某地到某地，我们送你们六里见方的土地呢。”

使者将张仪的这番话回报怀王，怀王这才发觉自己上了秦的当。大怒之下，他立即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年（怀王十七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是楚军大败，将士死伤

八万人，大将军屈匄等七十多位将领被俘，还被秦吞并了汉中郡一带的六百里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诈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便又派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到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次联合。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西方的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看到楚还不能一口吃掉，担心楚与齐恢复联合，便再次伸出橄榄枝，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郡六百里土地分一半还给楚。怀王旧恨未消，气冲冲地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又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这个祸害呢？”但是，当怀王再一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

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公元前305年（怀王二十四年）秦